

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叙事的时间焦点研究

李晓霞 刘也夫

摘要:作为知识生产机构和意识形态机器,智库通过对国际事件的时间组织来塑造特定叙事逻辑。时间焦点反映了叙事主体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信息的选择性关注,而文化距离所导致的认知差异可能影响智库的信息加工方式,进而塑造其时间性叙事。研究基于国外高影响力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的文本,考察文化距离对相关叙事时间焦点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现在焦点占优,其次为过去焦点和未来焦点;共建国与非共建国在过去焦点上无显著差异,但非共建国的现在焦点和未来焦点显著高于共建国。文化距离显著正向预测非共建国智库叙事的过去焦点和现在焦点,且风险感知在其间发挥遮蔽效应;对共建国,文化距离仅显著正向预测未来焦点,但风险感知未发挥作用。研究揭示了文化差异塑造智库时间性叙事的作用机制,为理解国际舆论竞争中涉“一带一路”倡议叙事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国外智库;“一带一路”倡议叙事;时间焦点;文化距离;风险感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5-0109-1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马工程重点项目(FJ2024MGCA053)

智库作为聚集国家智力资源的重要思想阵地,凭借其在知识生产方面的优势,深度参与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政府决策链中占据特殊地位^[1]。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随着其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球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区域联通持续提升,不仅逐步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也在地缘政治动态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引起国际智库的高度关注。通过专题报告、学术期刊、主题会议等形式,这些智库向本国政府和主流媒体提供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专业解读和政策建议。在塑造政策讨论方向的同时,他们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认知和公众的态度,从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合作和深入推进产生影响^[2]。因此,分析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的文本,不仅有助于揭示其对倡议的认知框架与政策研判,也能为理解相关国家政策讨论和公众舆论的潜在走向提供重要依据。

现有研究主要从议题设置、框架建构和隐喻策略等维度考察智库文本,分析智库如何通过内容选择、意义建构和符号表达形成特定叙事,为理解智库的认知建构过程提供了重要视角。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叙事意义如何生成,对叙事主体如何组织事件的时间关系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事实上,时间不仅是事件的客观要素,也是主体理解和解释现实的重要认知维度。根据时间焦点理论,个体对不同时间维度投入的注意力构成时间焦点,并影响其将过去经验、当前情境和未来预期纳入认知与判断的方式^[3]。语言研究表明,文本中的词语使用能够呈现注意焦点、情感状态和思维方式^[4]。在时间维度上,语言特征能够揭示文本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侧重^[5]。相关研究进一步将此逻辑延伸至对机构的研究中,通过股东信和年度报告测量管理者的时间焦点,验证了从机构文本中识别时间注意力配置的可行性^[6]。智库文本作为组织化生产的政策知识产品,其时间表达并非个体心理的直接流露,而是组织立场与理解方式的文本化呈现。因此,智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信息的选择性强调,可以被视为其组织化认知和政策理解方式的体现。考察智库涉“一带一路”倡

议各类文本中的时间焦点,有助于拓展既有智库叙事研究的分析维度,揭示国际议题意义建构中的时间结构。

然而,现有时间焦点研究主要基于个体层面的心理认知或一般性文化比较,对于文化差异如何塑造组织化叙事的时间焦点,以及这种时间焦点如何在关于国际议题的文本中呈现,尚缺乏深入讨论。跨文化研究表明,文化背景会塑造人们对不同时间维度的重视度及其时间认知方式^[7]。同时,文化距离与不同国家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情感倾向存在显著关联^[8]。“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国际议题,不同国家的智库对其意义的理解与阐释同样可能受自身文化环境和认知框架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考察文化距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外智库在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时形成的差异化时间焦点。运用计算文本分析方法,本研究首先将分析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报告文本中的时间焦点分布;其次将依据中国“一带一路”网^[9]公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2024年6月30日(样本观察期末)为时间节点,将样本国家划分为共建国与非共建国,在比较两类国家智库时间焦点差异的基础上,分别检验文化距离与时间焦点之间的关系,以期从跨文化视角深化对智库时间性叙事形成机制的理解。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作为智库叙事策略的时间焦点

当前国际舆论场域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复杂的话语竞争。部分西方国家依托既有话语优势,不断将倡议纳入所谓的地缘竞争、安全威胁和制度对抗等叙事框架,加剧了“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所面临的认知压力^[10]。根据战略叙事理论,政治行为体通过组织具有方向性和连贯性的话语,建构关于国际政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共同理解,并据此影响受众的认知与行动预期^{[11]2,5}。智库作为连接知识生产、政策咨询与公共舆论的重要主体,不仅提供事实信息和政策分析,也通过选择议题、解释事件和预测发展方向生产具有价值导向的战略叙事。循此逻辑,时间维度构成战略叙事组织话语、赋予意义的基本轴线,时间叙事也因此成为智库实现其角色功能的关键方式之一。

时间既是事件展开的客观序列,也是主体组织经验和建构意义的认知方式。个体对时间的理解和表征具有明显的主观性^[12]。不同主体会依据自身经验、所处情境和行动目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Shipp等将个体在三个时间维度上配置注意力的程度界定为“时间焦点”,并指出过去、现在和未来焦点是彼此相关但相对独立的维度^[3]。换言之,时间焦点揭示的并非物理意义上的时间顺序,而是不同时间信息在主体认知与判断中的相对显著性。这种差异可能影响主体对信息的加工与接受。与之相呼应,时间框架研究将视线从主体一侧转向信息一侧,考察信息在时间维度上的呈现方式如何影响传播效果。已有研究发现,强调即时后果的现在导向信息与突出长期后果的未来导向信息,会对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但具体效果受个体特征、行为身份和议题情境的制约^[13-14]。类似的结论亦见于消费研究,对现在或未来后果的不同强调会改变个体的即时消费倾向^[15]。综上所述,时间信息的组织与使用具有潜在的说服功能,时间因而可以成为智库战略叙事中可资调用的重要资源。

战略叙事对时间资源的调用,最终会落实为文本层面的时间组织,即叙述者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信息的选择、组合与关联方式。在此意义上,时间焦点不仅是文本的语言特征,也是考察智库如何理解和呈现政策议题的分析切入点。“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即具有纵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多重时间属性,恰为这一视角提供了典型的分析对象;其历史维度可以追溯古代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商贸往来、文明交流与互鉴传统^[16];现实维度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人文交流及高质量发展进程展开^[17];未来维度则指向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愿景^[18]。可见,历史记忆、现实实践与未来愿景的交织,使不同国家的智库得以依据自身经验与政策立场,对时间信息进行差异化的选择

与组合,进而形成各具侧重的叙事版本。

这种差异在既有个案研究中已初见端倪。美国智库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时,多以“马歇尔计划”等所谓“历史经验”为参照,在关注倡议当前进展的同时,侧重评估其所谓的潜在影响与风险^[2]。印尼智库则倾向于贯通历史与未来,将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往传统与合作前景相联结^[19],强调深化合作、增进相互理解。这些研究初步提示,国外不同国家的智库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注意力配置存在差异。然而,既有成果多聚焦单一国家或有限个案,既未系统呈现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时间焦点的总体面貌,也缺乏跨国层面的比较检验。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的叙事时间焦点的总体样态如何?

RQ2:共建国与非共建国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的叙事时间焦点是否存在区别?

(二)文化距离与智库“一带一路”倡议叙事的时间焦点

时间是社会主体理解现实的重要维度。社会系统通过区分过去、现在与未来,将复杂事件纳入可理解的时间结构,从而维持自身运行^[20]。换言之,时间结构并非自然给定而是因社会而异,不同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时间观念,会影响主体对过去经验、当前状态和未来可能性的关注方式^[21],这种差异化的关注正是时间焦点的社会文化根源。进一步而言,主体并非均衡处理所有时间信息,而是在特定文化框架下对过去、现在或未来进行选择关注。这一判断已获跨文化证据支持,Ji等通过实验发现,中国参与者相较于北美参与者更倾向于调用过去经验理解当前情境,表现出更强的“过去—现在”关联认知^[22]。Guo等则进一步揭示,文化差异对过去和未来价值判断的影响部分经由时间焦点实现,而当研究者引导参与者改变时间关注方向时,原有文化差异随之减弱^[23]。上述证据共同表明,时间焦点并非纯粹的个体心理特质,而是嵌入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认知取向,主体以何种时间焦点解释现实,受制于其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

在跨国传播情境中,文化差异可进一步操作化为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文化距离不仅衡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或差异程度,还反映国家文化体系之间的接近程度^[24]。更关键的是影响主体对外部群体的熟悉程度和心理接近感,并进一步影响其信息加工方式。解释水平理论为这一影响提供了心理解释机制,心理距离会影响主体对信息的认知表征方式。较近的心理距离通常激活低水平解释,使主体更多关注事件的具体特征、现实情境和即时影响;较远的心理距离则促进高水平解释,使主体倾向于从更抽象的层面关注事件的核心意义、整体关系及未来影响^[25]。由此可以推断,文化距离可能经由心理接近程度的中介,改变主体对不同类型信息的依赖方式。与此同时,时间维度构成了主体信息加工的不同认知资源。过去信息主要依托历史经验和记忆资源,为主体理解当前事件提供因果参照;现在信息关乎正在发生的事实、行动与现实影响;未来信息则依赖预测、假设与趋势推演,指向对未知结果的可能性判断。三类信息的认知分工恰好对应不同解释水平的信息需求。由此推测,文化距离可能经由心理接近程度,改变主体对时间信息的相对依赖,进而表现为时间焦点上的差异。

上述心理机制虽在个体层面展开,但将其延伸至智库组织,并非将其人格化。一方面,战略文化研究表明,国家文化所形成的共享价值与认知模式,会影响国家决策者对外部环境的理解与偏好^[26]。另一方面,组织认知研究亦指出,组织经由议题选择、知识筛选^[27]等,将个体认知整合为相对稳定的观察框架^[28]⁷¹。据此,文化距离可能通过文本生产者的认知惯习与组织化的意义建构过程,沉淀为智库文本中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信息的差异化配置,成为影响智库文本时间焦点选择的重要因素。

此外,文化距离的作用并非脱离国家关系情境而独立发生。国家间长期互动积累的合作经验,可能使文化距离对意义建构的影响呈现差异。内群体身份模型为此提供了理论解释,当不同群体成员被重新归类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共同体时,原有群际边界趋于弱化,群际偏见也随之减少^[29]⁴⁴⁵⁻⁴⁴⁷。中医国际传播研究发现,共建国因长期互动形成稳定的接受框架,文化距离对其情感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非共建国,文化距离的作用依然突出^[30]。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研究

进一步揭示,文化距离与报道情感的关系形态随国家合作关系而异,共建国呈倒U型关系,非共建国则为线性负向关系^[8]。由此可见,国家合作关系并非文化距离之外的简单分类变量,而是使文化距离之叙事效应呈现差异的关系情境。对智库而言,合作积累的共同经验同样可能改变其调用历史记忆、把握现实状态与推演未来走向的方式。遗憾的是,文化距离与智库叙事时间焦点之间的关系是否因共建关系而呈现差异,现有研究尚未考察。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RQ3:对于共建国与非共建国,文化距离对其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的叙事时间焦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三) 风险感知在文化距离与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叙事的时间焦点间的作用

风险感知并非客观危险的直接呈现,而是主体基于已有知识、经验和价值体系,对潜在威胁及未来后果进行判断和解释的过程^[31]。风险社会理论将这一建构性推向社会层面,现代风险具有未来性与不确定性,难以被直接感知,必须借助社会知识体系加以理解和解释^{[32]27,52}。循此逻辑,智库的风险判断便体现于组织知识生产过程中对议题属性的界定与文本表达。安全化理论指出,威胁并非客观给定,而是行为体经由话语实践建构的产物^{[33]24-26}。同时,战略叙事理论认为,政治行为体通过将威胁来源、因果进程和潜在后果组织为具有时间结构的连贯故事,使抽象的不确定性被具体化为可识别的威胁图景,并塑造受众对事件及其未来走向的理解^{[11]7-12,22-23,105}。在这一过程中,风险构成战略叙事界定问题、建构冲突与预测未来的重要资源。据此可以推断,智库文本中的风险感知并非个体心理状态,而是通过风险感知与威胁叙事呈现出来的组织化认知形式。

跨文化研究进一步发现,文化价值体系会影响主体对风险的选择性关注和评价方式,不同文化群体对于潜在威胁和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34]。可见,风险判断并非完全由事件本身决定,而可能受主体文化环境和认知框架的影响。既有国际商务研究揭示了文化距离影响风险判断的作用机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文化距离会增加跨国经营中的信息获取、沟通和信任建立成本,使主体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35]。外来者劣势理论则指出,文化距离会削弱主体对陌生制度环境和社会规范的理解能力,增加合法性压力和环境不确定性^{[36]196,199}。前者压缩了风险判断的信息基础,后者削弱了风险判断的解释框架。由此观之,文化距离并非直接决定风险判断结果,而是经由信息基础与解释框架,改变主体理解和评价外部事件的方式。将这一逻辑推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涉及经济合作、政治关系、技术竞争与文化互动的复杂议题,不同国家智库对其风险与机遇的判断,并不完全取决于倡议本身,还受到各自所处文化环境、经验基础与认知框架的深刻影响。简言之,文化距离可能影响智库的风险感知。

进一步而言,风险感知可能影响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不同时间维度的选择性强调。战略叙事本身具有明显的时间结构,它通过连接过去经验、当前问题与未来结果,形成完整的问题解释框架^{[11]2}。一方面,风险所关注的是尚未发生但可能造成影响的潜在后果,因此,风险导向的叙事可能更多诉诸未来情境,推演倡议的长期影响、战略风险与潜在挑战。已有实证研究发现,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威胁”表述往往表现为行动号召,且部分讨论明确具有未来指向,通过预测中国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及其对美国利益和地区秩序的潜在影响,为相应政策主张提供依据^[37]。另一方面,风险判断并不必然表现为未来信息的增加。国家安全叙事通常将过去的失败与胜利、当前挑战及潜在未来组织在同一情节之中,而危机和威胁还可能选择性激活历史叙事,使行为体借助既往经验与身份连续性理解当前形势^[38]。换言之,为说明威胁从何而来、增强风险判断的可信性,智库同样可能调取历史事件与当下事实,以过去和现在作为识别风险、推演后果的依据。可见,风险感知究竟是强化未来焦点,还是重组过去、现在与未来信息的相对配置,现有研究尚无定论。这意味着,风险感知是否介入文化距离与叙事时间焦点的关系、以何种方向和方式介入,均需经验证据加以检验。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RQ4:共建国与非共建国的风险感知是否以及如何在文化距离与时间焦点的关系中发挥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 样本数据采集

研究者基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 2020》(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39],选定美国、英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主要的非共建国,并从中选取高影响力的智库。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匈牙利作为主要的共建国,也选取其高影响力的智库进行分析。为了尽可能全面获取相关数据,研究者在各智库的官方网站上使用多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包括“one belt, one road”“OBOR”“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ilk road”和“new silk road”。数据的时间范围设定为 2013 年 9 月至 2024 年 6 月。由于倡议提出至 2013 年年末的时间较短,且所选智库在此期间未发布符合筛选标准的相关分析报告,2013 年未形成有效样本。因此,本研究最终纳入的报告实际发布于 2014 年至 2024 年。采集的信息包括报告标题、发布机构、发布日期、发布地点、发布国家、作者及正文等。

在样本清洗筛选方面,鉴于研究涉及国家众多,相当部分国家并非以英语为母语,因此,智库来源的权威性就成为筛选样本的重要考量。围绕这一标准,对所涉国外智库机构逐一进行甄别。首先,研究分析第一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发现所涉机构均为权威机构。然后,对第一母语非英语的国家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①第一母语虽不是英语,但第二母语为英语,在这类国家中,所涉机构具有权威性,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②虽然母语中没有英语,但英语较为流行,在这类国家中,所涉机构亦被认为是本国权威智库,如泰国、以色列、土耳其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③部分发达国家虽不是英语系国家,但其智库亦发布英文调研文本。按照上述设定,最终保留 2135 条智库文本。

(二)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时间焦点:本研究的时间焦点数据源于智库样本中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文本。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分析领域,语言学探索软件(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简称“LIWC”)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词典基础工具,为研究者揭示文本中的隐含心理语言学特征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手段。LIWC 词典中的时间导向维度主要分为三个子词典:过去焦点(focus past)、现在焦点(focus present)和未来焦点(focus future)。具体而言,过去焦点组包含 90 个词汇,例如“was、were、ago、already、did、had”等;现在焦点组包括 91 个词汇,如“am、are、be、do、does、is、now、present”等;未来焦点组则包含 92 个词汇,如“ahead、expect、going、foresee、gonna、will”等。这一方法已在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多个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具备可靠性。在技术实施上,首先,统计文本中涉及不同时间焦点信息的词频;其次,计算与时间焦点相关的词汇在全文词汇总量中的占比,进而得到相关的数值,单位为%,数值为连续性变量($\text{Min}_{\text{过去}} = 0, \text{Max}_{\text{过去}} = 7.690, \text{M}_{\text{过去}} = 2.213; \text{Min}_{\text{现在}} = 0, \text{Max}_{\text{现在}} = 7.510, \text{M}_{\text{现在}} = 3.320; \text{Min}_{\text{将来}} = 0, \text{Max}_{\text{将来}} = 4.840, \text{M}_{\text{将来}} = 1.097$)。以此,我们能够捕捉文本中的叙事时间焦点。

鉴于词典法测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去语境化”特征,为检验时间焦点指标在本研究语境下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进一步引入人工编码作为参照。研究者从总体样本中进行分层抽样,按 10% 的比例最后抽取 214 份样本,由两位研究者依据时间焦点的操作性定义,对文本中是否存在以过去经验、当前状态或未来预期为主要叙事参照的时间取向进行独立判断。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在过去焦点的人工标注上,两位编码员的 Cohen's Kappa 系数为 0.713;在现在焦点的标注上,两位编码员的 Cohen's Kappa 系数为 0.813;在未来焦点的标注上,Cohen's Kappa 系数为 0.786,均达到可接受的一致性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焦点在样本中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分布,多数文本均被判断为存在以当前情境为参照的叙事取向。在类别分布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传统的 Kappa 系数容易受到基数效应影响

而被低估,因此本研究未将现在焦点的 Kappa 数值作为主要信度指标,而是将其视为政策文本中一种高度嵌入式、默认性的时间参照框架。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时间焦点反映的是文本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叙事侧重强度,而非互斥的类别判断,研究将两位编码员在各时间维度上的判断结果取均值,构建人工时间焦点指标,并与 LIWC 计算得到的对应时间焦点比例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标注结果与 LIWC 测量在过去焦点维度上呈现出 0.1 水平边缘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117;在现在焦点与未来焦点维度上,二者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346 ($P < 0.01$) 和 0.241 ($P < 0.01$)。整体而言,人工判断与基于词典的自动化测量在变化方向上保持一致,为 LIWC 方法在刻画智库文本时间焦点倾向方面的测量效度提供了支持。

2. 解释变量

文化距离:本研究采用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数据来测算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具体包括权力距离、个人/集体主义、男/女性化、不确定性规避、长/短期导向和放纵与约束等六个文化维度理论。各国六个文化维度得分来源于 Geert Hofstede 官方网站的 Dimension Data Matrix^[40]。在获得各个国家相应的指数之后,借鉴国内外学者通用的方法,根据 Kougut 等的跨国文化距离模型^[41]计算不同国家与我国的文化距离,具体公式为:

$$CD_j = \sum_{i=1}^6 \{ (I_{ij} - I_{iN})^2 / V_i \} / 6$$

其中, CD_j 是中国与 j 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I_{ij} 是 j 国在第 i 个文化维度上的计分; I_{iN} 是中国在第 i 个文化维度上的计分; V_i 是每一个文化维度计分的方差。通过公式最终获得文化距离的数据 ($\text{Min}_{\text{文化距离}} = 0.692$, $\text{Max}_{\text{文化距离}} = 4.232$, $M_{\text{文化距离}} = 3.775$),数值越大,表示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越远。

3. 中介变量

风险感知:词汇使用作为一种隐性行为指标,能够有效避免自陈问卷中常见的反应偏差或社会赞许问题。对词汇使用的分析为心理分析提供新的视角,并为心理机制的研究提供重要行为指标。本研究同样采用 LIWC 词典工具分析智库文本中包含风险倾向的词组,该词组包括“alarm、bad、crisis、danger、fail、hazard、save、risk、protect、threat、warm”等,进而计算与风险相关的词汇占文本总词汇的比例,获得风险的变量数值 ($\text{Min}_{\text{风险感知}} = 0$, $\text{Max}_{\text{风险感知}} = 4.960$, $M_{\text{风险感知}} = 0.592$),该数值的单位为%,数值越大,风险感知越强烈。

考虑到词典测量可能难以完全覆盖复杂政策叙事中的风险意涵,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人工编码方式对部分样本进行效度检验。具体而言,研究者按照国家进行分层抽样,从总体样本中选取 10%,共 214 份文本,由两位经过统一培训的编码员进行独立评估。人工编码以文本整体论证结构为判断依据,重点考察风险、不确定性或潜在负面后果是否构成文本的重要议题,并据此对风险感知水平进行分级判断。人工编码结果显示,两位编码员在风险感知判断上的一致性较高,Cohen's Kappa 系数为 0.791,表明人工编码具有良好的信度。在此基础上,研究将人工标注得到的风险感知水平与 LIWC 风险相关词汇比例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184 ($P < 0.01$)。该结果表明,尽管 LIWC 属于基于词频的自动化测量工具,但其风险词汇指标能够在总体趋势上有效反映文本中的风险取向,具有可接受的测量效度。

4. 其他控制变量

制度距离:参照王永钦等的制度距离测算方法^[42],首先,选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简称“WGI”)中包括话语权和问责、政府稳定和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质量、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在内的六项子指标指数^[43]。其次,分别将六个指标相加取其均值,将不同国家的均值与中国的均值相减,最后取绝对值获得相关的代理变量数据 ($\text{Min}_{\text{制度距离}} = 0.129$, $\text{Max}_{\text{制度距离}} = 2.052$, $M_{\text{制度距离}} = 1.309$)。

地理距离:借鉴蔡建红等的思路,依据中国首都北京与样本中各国首都地区的球面距离测算而得^[44]($\text{Min}_{\text{地理距离}} = 2098.110$, $\text{Max}_{\text{地理距离}} = 11,159.250$, $M_{\text{地理距离}} = 10,110.786$)。具体数据采用法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的 CEPII 数据库^[45],该数据库提供各国首都或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数据,以千米为单位。

情感指数:情感极性是情感分析中考察文本情感倾向的重要变量,主要是依据一个文本中的正面词汇量和负面词汇量计算而来。常用的计算公式为:(积极词汇量-消极词汇量)/(积极词汇量+消极词汇量)^[46],该数值为连续变量($\text{Min}_{\text{情感}} = -4.030$, $\text{Max}_{\text{情感}} = 1.470$, $M_{\text{情感}} = -0.162$)。从公式可知,情感极性的数值越大,文本的情感倾向越正面,反之,文本的情感倾向越负面。

三、数据结果分析

(一) 概况描述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的三类时间焦点呈明显的梯度分布:现在焦点最高($M_{\text{现在}} = 3.092$, $SD_{\text{现在}} = 1.198$),过去焦点次之($M_{\text{过去}} = 2.178$, $SD_{\text{过去}} = 1.021$),未来焦点最低($M_{\text{未来}} = 1.039$, $SD_{\text{未来}} = 0.634$),总体呈“现在主导、过去居中、未来从属”的分布格局。

图1展示从倡议提出后的首个完整观察年度开始,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叙事的时间焦点变化情况。总体来看,三者均未出现大幅波动,表明智库叙事的时间取向具有较强的结构稳定性。具体而言,过去焦点在倡议提出初期(2014—2017年)小幅上升,显示智库在面对新倡议时更多借助既有经验与历史参照理解其背景与逻辑;进入持续推进阶段(2018—2021年)后,过去焦点略有回落,分析视角逐渐从既往参照转向对现实进展的观察与评估。现在焦点在各年份均维持最高水平,并在项目推进与外部环境变化较为密集的时期有所上升,构成智库分析的核心时间取向。未来焦点则呈缓降后趋稳的态势,波动幅度同样有限,显示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长期前景的讨论相对审慎,叙事重心始终落在既有事实与现实进展之上。以上结果完整回答了RQ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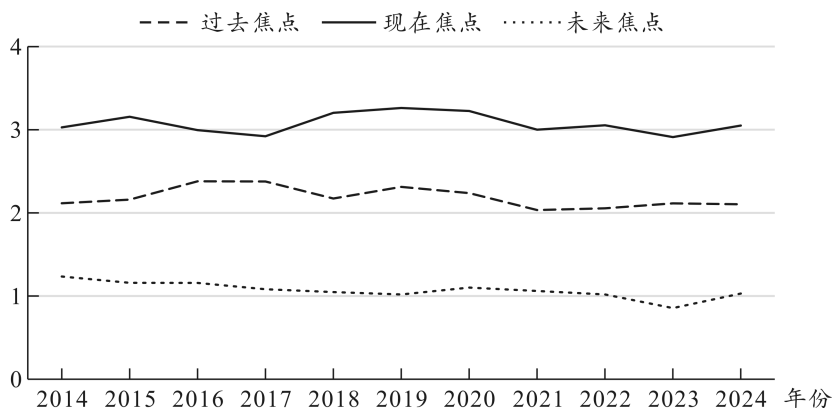


图1 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的时间焦点变化趋势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图2显示,两组文本在过去焦点上无显著差异($t(2133)$, $p > 0.05$),在现在焦点上,非共建国显著高于共建国($M_{\text{非共建}} = 3.320$, $SD_{\text{非共建}} = 1.207$; $M_{\text{共建}} = 2.779$, $SD_{\text{共建}} = 1.112$; Welch's $t(2020.399) = 10.708$, $p < 0.001$),未来焦点呈相同方向,非共建国亦显著高于共建国($M_{\text{非共建}} = 1.097$, $SD_{\text{非共建}} = 0.626$; $M_{\text{共建}} = 0.958$, $SD_{\text{共建}} = 0.634$; $t(2133)$, $p < 0.001$)。可见,两组智库文本时间焦点的组间差异集中于现在与未来两个维度——非共建国智库对当前进展与未来走向的关注均高于共建国,而过去焦点上两组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回答了RQ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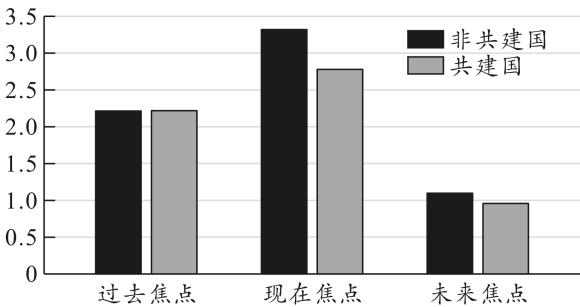


图 2 共建国与非共建国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的时间焦点差异

(二)文化距离对叙事时间焦点的异质性影响

为检验文化距离对不同类型国家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时间焦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分别对共建国与非共建国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虑到制度距离、地理距离与情感指数可能干扰智库的叙事时间取向,模型将上述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具体见表 1。鉴于各自变量在数值范围与量纲上存在显著差异(如地理距离、时间焦点与风险感知等),为避免量纲差异对模型估计稳定性与参数解释造成影响,本研究在建模前对所有连续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从而保证不同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可比性,并提高混合线性模型估计的稳健性。

表 1 文化距离对叙事时间焦点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过去焦点 (共建国)	现在焦点 (共建国)	将来焦点 (共建国)	过去焦点 (非共建国)	现在焦点 (非共建国)	将来焦点 (非共建国)
文化距离	-0.025 (0.072)	-0.028 (0.078)	0.093 * (0.045)	0.414 ** (0.154)	0.325 [†] (0.183)	0.064 (0.094)
制度距离	-0.061 * (0.029)	-0.220 *** (0.032)	-0.029 (0.018)	-0.085 (0.124)	-0.089 (0.146)	-0.098 (0.075)
地理距离	-0.210 ** (0.073)	0.054 (0.077)	-0.106 * (0.045)	-0.366 ** (0.088)	-0.010 (0.104)	0.017 (0.054)
情感指数	0.012 (0.035)	0.053 (0.078)	0.092 * (0.022)	-0.021 (0.028)	-0.136 *** (0.033)	0.092 *** (0.017)
截距	1.904 *** (0.060)	2.667 *** (0.064)	0.947 *** (0.037)	2.188 *** (0.076)	3.317 *** (0.089)	1.083 *** (0.046)
R ²	0.033	0.064	0.029	0.028	0.019	0.030
调整 R ²	0.028	0.060	0.025	0.025	0.015	0.026

备注:*** p<0.001, ** p<0.01, * p<0.05, [†]p<0.1, () 为 SE。

回归结果显示:在共建国样本中(模型 1~3),文化距离对过去焦点与现在焦点的影响均不显著($\beta=-0.025, p>0.1; \beta=-0.028, p>0.1$),但显著正向预测未来焦点($\beta=0.093, p<0.05$),即文化差异越大,共建国智库反而越倾向于采用面向未来的叙事。在非共建国样本中(模型 4~6),文化距离显著正向预测过去焦点($\beta=0.414, p<0.01$),即双边文化差异越大,智库越倾向于使用过去视角的叙事;对现在焦点呈边缘显著的正向影响($\beta=0.325, p<0.1$);对未来焦点的影响不显著($\beta=0.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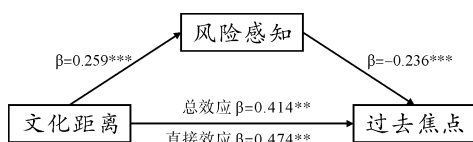
$p>0.1$)。综合来看,文化距离对叙事时间焦点的影响因国家类型而异:在共建国中仅作用于未来维度,在非共建国中主要作用于过去及现在维度。该结果回答了 RQ3。

为检验上述结果是否受到不同国家之间系统性差异及同一国家内文本聚类效应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以文本为第一层级,国家为第二层级的线性混合模型,在固定效应中纳入文化距离及前述控制变量,并在国家层设定随机截距。结果显示:在共建国样本中,过去、现在及将来时间焦点模型的国家层随机截距方差估计值分别为 0.068、0.276 和 0.033;在非共建国样本中,上述三类模型的方差估计值分别为 0.136、0.009 和 0.004。两组样本中所有模型的随机截距方差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1$),表明在本研究样本中,国家层级的剩余差异较为有限。进一步计算类内相关系数(ICC)以评估国家层级聚类效应。结果显示:在共建国样本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焦点模型的 ICC 分别为 0.065、0.195 和 0.081;在非共建国样本中,ICC 分别为 0.119、0.007 和 0.011。总体而言,国家层级解释的变异比例有限,时间焦点差异主要存在于文本层面,说明以文本为分析单位的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三) 风险感知的遮蔽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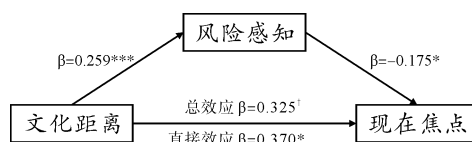
为进一步考察风险感知在文化距离与叙事时间焦点之间的作用,本研究采用 PROCESS 宏程序(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估计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

非共建国样本的结果显示,文化距离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了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的过去焦点。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文化距离对过去焦点的总效应($\beta=0.414$, $p<0.01$) 在控制中介变量风险感知后仍显著,中介效应大小为 -0.060,估计区间不包含 0 (LLCI = -0.1121, ULCI = -0.0206),其中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间的符号相反。根据温忠麟等对遮蔽效应的界定,总效应显著而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方向相反,总效应的绝对值因此被压低^[47],可判定风险感知在文化距离与过去焦点之间发挥遮蔽效应,详见图 3。现在焦点呈现相似模式,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文化距离对现在焦点的总效应($\beta=0.325$, $p<0.1$) 在控制中介变量风险感知后仍显著,中介效应大小为 -0.045,估计区间不包含 0 (LLCI = -0.1050, ULCI = -0.0049),但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间的方向相反,因此判定为遮蔽效应,详见图 4。最后,风险感知在文化距离与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的未来焦点之间的作用不显著(估计区间包含 0)。共建国样本中,风险感知在文化距离与三类时间焦点之间的间接效应均不显著(置信区间均包含 0)。综上,风险感知的遮蔽效应仅存在于非共建国样本,且集中于过去与现在两个时间维度。这一结果回答了 RQ4。



备注: *** $p<0.001$, ** $p<0.01$, * $p<0.05$, † $p<0.1$

图3 风险感知在文化距离与过去焦点间的遮蔽效应 (非共建国)



备注: *** $p<0.001$, ** $p<0.01$, * $p<0.05$, † $p<0.1$

图4 风险感知在文化距离与现在焦点间的遮蔽效应 (非共建国)

(四) 稳健性检验

鉴于本研究样本主要源于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地区,对于日本、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等非英语母语国家,其智库发布的母语文本往往更侧重于本国受众,因此仅分析其英文文本可能存在潜在的“受众定向偏差”。为检验该偏差是否会对研究结论产生系统性干扰,本研究在不改变原有研究设计的前提下,补充收集了上述国家智库发布的日语、匈牙利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文本共 71 份,并经翻译处理后纳入全样本,作为稳健性检验样本,对主要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进行再估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在纳入母语文本后,文化距离、风险感知与时间焦点之间的核心关系在方向与显著性上均保持一致,其中,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风险感知在文化距离与过去焦点、现在焦点之间均发挥遮蔽效应,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0.059 和-0.056,中介效应结果亦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考虑到非英语母语国家公开发布的智库研究文本数量本身较为有限,且国际政策沟通中英文文本占据主导地位,上述补充分析的目的在于检验结论对语言扩展的敏感性,而非替代原有英文样本。总体而言,结果表明“受众定向偏差”并未对本研究所揭示的结构性机制产生实质性影响,基于英文文本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2 文化距离对叙事时间焦点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过去焦点 (共建国)	现在焦点 (共建国)	将来焦点 (共建国)	过去焦点 (非共建国)	现在焦点 (非共建国)	将来焦点 (非共建国)
文化距离	-0.009 (0.071)	-0.017 (0.076)	0.085 [†] (0.044)	0.402 ^{**} (0.152)	0.316 [†] (0.181)	0.057 (0.093)
制度距离	-0.061 [*] (0.029)	-0.226 ^{***} (0.031)	-0.022 (0.018)	-0.051 (0.122)	-0.151 (0.145)	-0.117 (0.074)
地理距离	-0.219 ^{**} (0.073)	0.053 (0.079)	-0.102 [*] (0.046)	-0.333 ^{**} (0.082)	-0.098 (0.097)	0.010 (0.050)
情感指数	0.015 (0.034)	0.054 (0.037)	0.087 [*] (0.021)	-0.025 (0.027)	-0.140 ^{***} (0.032)	0.090 ^{***} (0.017)
截距	1.936 ^{***} (0.058)	2.683 ^{***} (0.062)	0.947 ^{***} (0.036)	2.159 ^{***} (0.066)	3.232 ^{***} (0.079)	1.117 ^{***} (0.040)
R^2	0.030	0.068	0.025	0.030	0.017	0.028
调整 R^2	0.026	0.064	0.021	0.027	0.014	0.025

备注:*** p<0.001, ** p<0.01, * p<0.05, [†]p<0.1, () 为 SE。

四、结论与讨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进与深化,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动态过程,智库围绕该倡议的叙事,同样是在这一时间结构中展开的意义建构。时间焦点作为叙事策略的时间维度,不仅是文本的语言特征,更集中体现着不同国家智库评估倡议时的战略态度与价值倾向。本研究以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为分析对象,运用计算文本分析方法考察过去、现在与未来三类时间焦点的总体分布与年际变化;引入文化距离与风险感知变量,比较共建国与非共建国智库相关叙事中时间焦点的差异,并检验文化距离作用于时间焦点的内在机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一)国外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叙事策略

本研究首先揭示了国外智库涉“一带一路”倡议文本中的时间叙事的总体结构:现在焦点占主导,过去焦点次之,未来焦点相对较弱,且十余年间保持高度稳定。稳定的结构可以从智库的组织功能得到解释。智库是面向政策实践的知识机构,其基本工作是对现实问题作出判断、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方案^[48]。在三类时间信息中,现实状态是政策分析的直接依据,历史经验为因果解释提供参照,未来研判服务于战略预案,唯有现在是政策必须立即回应的对象。就此而言,现在焦点的主导并

非语言习惯使然,而是智库知识生产方式在文本中的呈现。这一发现呈现出战略叙事研究既有讨论中较少触及的一个面向。既有战略叙事研究强调政治行为体通过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为国际事件赋予方向性意义^{[11]2}。本研究进一步表明,智库战略叙事不仅体现为议题选择、意义框定与观点传播,也体现为对不同时间维度的组织。三个时间维度在叙事中的功能并不相同,强调哪个时间维度,本身就是对议题进行定位的一种方式。

进一步看,共建国与非共建国的智库在过去焦点上没有显著差异,在现在与未来焦点上则明显分化。这一差异可以从时间资源的可争夺性来理解。从战略叙事的“时间资源竞争”假说来看,时间维度被视为一种有限的叙事资源配置对象,不同行为体在叙事竞争中,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根据议题的“解释权开放性”进行策略性分配。就过去焦点来说,也即历史叙事,其存在共同脚本(如“丝绸之路”)时,解释空间被压缩,属于“低竞争性资源”,因此共建国与非建国在过去焦点上趋于一致,并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然而倡议的现状如何评价、未来走向何方,尚无公认答案,属于“高竞争性资源”,不同的国家都希望通过强化或弱化“现在”与“未来”焦点,来争夺对议题走向的塑造权。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焦点并不必然代表积极的未来愿景,而更多体现主体对未来可能结果的关注与评估。对于非共建国而言,由于缺乏直接合作经验,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更多依赖外部观察,需要通过讨论当前影响和未来走向来降低不确定性、形成判断,因此在现在与未来焦点上相较于共建国投入更多叙事资源。由此,现实与未来成为国际话语竞争的主要空间,而历史则构成竞争的共同起点。基于此,研究将智库战略叙事研究从“叙事如何连接时间”推进到“主体如何分配时间资源”,即时间焦点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主体对议题现状与前景的不同判断。

(二)文化距离塑造智库时间叙事的关系

文化距离长期被视为影响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并非脱离具体关系情境而直接发生。本研究发现,在非共建国中,文化距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过去焦点和现在焦点;在共建国中,其影响则集中于未来焦点。由此可见,文化距离并非直接、单向地影响认知,而是必须经过“双边互动经验”这一中介情境的“转译”,才能进入叙事结构。为此,本研究将文化距离区分为“认知性距离”与“经验性距离”,前者源于互动不足所造成的认知陌生,后者则体现为合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的发展目标与意义差异。双边互动经验并不会简单消除文化距离,而是改变文化距离被感知、解释和叙述的方式:在低互动情境中,文化距离被转化为一种需要解释的陌生性;在高互动情境中,文化距离则被转化为一种需要协商的异质性。正是这种转译机制,使文化距离在不同关系情境中指向不同的时间焦点。

具体而言,在非共建国中,由于缺乏直接合作经验,文化距离更容易表现为认知性距离。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规范差异越大,智库越难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既有认知框架,因而更可能产生困惑、认知不协调与不确定感。为恢复认知连贯性,智库倾向于借助历史类比理解倡议的来源,以当前事实检验其现实表现,从而强化过去焦点和现在焦点。同时,合作经验不足也意味着信息有限、关系信任较弱,未来判断面临更高的预测风险。智库因此更可能采取防御性叙事策略,强调过去与现在的确定性信息,避免对未来作出过度承诺。

对共建国来讲,由于处于互动情境中,持续合作将文化距离“去陌生化”,差异不再构成解释障碍,反而因共享经验的积累,激发对合作潜力的探索,叙事表现为“向前看”(未来焦点)。换言之,合作经验的存在改变了信息环境。共建国智库拥有更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手信息(项目参与、政策沟通、人员往来等),这降低了过去与现在信息的需求弹性——它们不再需要过度依赖历史类比或现状评估来理解倡议。然而,文化距离仍然影响未来焦点,原因可能在于,未来愿景的建构需要更高程度的意义协商。即使合作经验提供了事实层面的共识,文化差异仍可能导致对“共同未来”的想象存在分歧。共建国智库在叙述未来时,仍需在自身发展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之间进行调和,文化距离在此环节持续发挥作用。

总体而言,文化距离本身并不决定其效应方向,关系经验才是关键的边界条件。既有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国际经验能够缓解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49]。本研究将这一逻辑从企业绩效拓展至叙事时间结构,表明共建经验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关系积累,能够重塑文化距离对时间焦点的作用路径。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回应并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解释边界。已有成果注意到,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认知的影响并非单向,而受国家关系与互动情境的制约^[8],关于文化距离双重效应的讨论亦指出,异质文化间的距离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催生新的意义连接与文化转化^[30]。本研究将上述线索由传播效果层面的态度差异,推进到叙事生成层面的认知机制:文化距离不仅左右主体对议题的评价结果,更参与其对议题时间信息的选择与配置——文化距离的双重效应由此在时间维度上获得新的经验证据。

(三) 风险感知的遮蔽效应

本研究在机制层面的关键发现是,风险感知并非文化距离影响时间焦点的普遍中介机制,而是一种受到关系情境约束的条件性认知机制。在非共建国样本中,风险感知并未简单传导文化距离的影响,而呈现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方向相反的遮蔽效应;在共建国样本中,该效应并未出现。

遮蔽效应的产生,与非共建国的所谓“威胁论述”的成熟程度有关。如前所述,文化距离越大,智库越需要借助过去与现在的信息理解倡议,这构成正的直接效应,但文化距离同时也更容易激活风险感知。在非共建国,所谓的“中国威胁”是一套现成的解释框架,判断风险无须逐一列举历史证据和现实依据,沿既定框架即可完成对议题的界定。此时,过去与现在的信息虽仍在风险论证中使用,但只是作为所谓“风险”的注脚,其作为独立时间焦点的分量随之下降,叙事由“依时举证”转为“依框架定性”。未来焦点未受影响,亦与框架的现成性有关,成熟框架不仅给出对议题的定性,也预置了对其走向的判断,风险感知的激活既无须补充经验举证,也无须展开额外的趋势推演,未来信息的使用因而维持原状。共建国未出现遮蔽效应,原因在于风险感知的形成条件不同。在持续合作中,智库对倡议的了解来自具体项目与直接互动,文化距离不再被解读为风险信号,也就无法经由风险感知影响时间焦点。这一对比说明,风险感知能否成为文化距离与时间焦点之间的机制,取决于相关的所谓“威胁解释框架”是否产生影响。

这一发现进一步拓展对风险叙事研究的认识。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风险的未来性与不确定性,在本质上表达一种未来成分^{[34][33]}。按此预期,风险感知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认知框架,应强化主体对未来后果的关注。本研究的发现却指向相反方向,风险感知并未提升未来焦点,反而抑制了过去与现在信息的使用。原因在于,当所谓的“威胁”已被既有框架定义时,风险就不再是不确定的可能性,而是无须论证的前提,即主体既不必追溯历史、检视现实来确认它,也无须推演未来来评估它。风险的叙事力量,由此不在于把视线引向未来,而在于重组既有的时间信息。在风险感知下,过去被改写为“问题”的来源,现在被解读为“威胁”的迹象。对战略叙事研究而言,这意味着叙事竞争不仅在于选择强调哪个时间维度,也在于由谁规定各时间维度的意义,这一解释权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权力。

综上,风险感知是文化距离影响时间焦点的条件性机制,它以威胁框架的成熟为前提,以压缩而非转移时间焦点的方式发挥作用。

五、结语

本研究表明,国外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并非由单一信息输入决定,而是在文化距离、合作经验和风险判断共同作用下形成。因此,国际传播实践需要从“统一化传播”转向“差异化叙事”。针对非共建国,应加强基于事实、案例以及如“中国建造”^[50]等具体项目的信息沟通,降低因认知距离和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化解读;同时也应看到,在所谓“威胁框架”业已成熟的环境中,单纯的信息供给作用有限,还需通过智库对话、实地考察、人员往来等方式增加直接接触,以一手经验松动既有成见。针对共建国,则应进一步挖掘长期合作潜力,通过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和区域治理等未来导向

议题,强化共同发展预期。同时,应重视时间维度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通过历史经验增强理解基础、现实成果提升信任水平、未来愿景凝聚合作期待,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传播从信息传递走向意义共建。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以文本中的时间焦点与风险表达表征智库认知,但文本是宏观文化、中观组织与微观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相关指标因而难以完全分离不同层次因素的影响。除宏观文化环境外,智库的组织属性、规模与资源禀赋,以及文本生产者的人格特质、年龄和性别等个体特征,均可能通过组织知识生产机制影响文本的时间表达。受组织与作者层面数据获取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对这些影响来源进行充分分解和控制,文本指标反映的主要是多层因素叠加后的综合效应。未来研究可沿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打通宏观文化环境、中观组织属性与微观生产者特征的数据,构建多层解释模型,以识别不同层次因素的相对贡献;二是结合实验或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文本分析所揭示的作用机制进行因果层面的检验。

参考文献:

- [1] 赵恒煜. 美国智库如何研究中国——一种基于文本框架的质性分析方法[J]. 情报杂志, 2022(12): 29-37+88.
- [2] 朱永彪, 王俊超. 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实施十年来的认知评析[J]. 情报杂志, 2023(12): 83-92.
- [3] Shipp A J, Edwards J R, Lambert L 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emporal focus: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9, 110(1): 1-22.
- [4] Tausczik Y R, Pennebaker J W. The psychological meaning of words: LIWC and computerized text analysis methods[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29(1): 24-54.
- [5] Park G, Schwartz H A, Sap M, et al. Living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easuring temporal orientation with languag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7, 85(2): 270-280.
- [6] Nadkarni S, Chen J. Bridging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CEO temporal focus,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nd rate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57(6): 1810-1833.
- [7] Callizo-Romero C, Tutnjević S, Pandza M, et al. Temporal focus and time spatialization across cultures[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020, 27(6): 1247-1258.
- [8] 宣长春, 林升栋. 文化距离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 4918 篇英文新闻报道的情感分析(2013—2019 年)[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6): 24-43+126.
- [9] 中国“一带一路”网[EB/OL]. [2025-09-30]. <https://www.yidaiyilu.gov.cn/>.
- [10] 宣长春. “一多互补”思维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阐释与传播进路[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6): 86-95+127.
- [11] Miskimmon A, O'Loughlin B, Roselle L.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2] 肖燕. 时间参照框架与时间表征的主观性[J]. *外国语文*, 2015(6): 75-80.
- [13] Orbell S, Kyriakaki M. Temporal framing and persuasion to adopt preventive health behavior: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on sunscreen use[J]. *Health Psychology*, 2008, 27(6): 770-779.
- [14] Zhao X, Nan X, Iles I A, et al. Temporal framing and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effects on smokers' and at-risk nonsmokers' responses to cigarette health warnings[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5, 30(2): 175-185.
- [15] Kim D H, Jang S C S. Stress and food choices: examining gender differences and the time horizon framing effec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7, 67(8): 134-142.
- [16] 蒲小平. “一带一路”十年建设的成就及时代内涵[J]. *国际论坛*, 2023(3): 37-51+156-157.
- [17] 李文琪, 许勤华.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历史成就、现实挑战和未来展望[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8): 107-114.
- [18] 赵燕. “一带一路”倡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J]. *社会科学家*, 2023(5): 31-37.
- [19] 宋国新, 赵梓岩, 肖梓澍. 印尼智库对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分析[J]. *情报科学*, 2024(6): 186-193.

- [20] 郑作斌. 时间的系统构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时间概念[J]. 社会学研究, 2022(2): 69-91+227-228.
- [21] Yeganeh H. Conceptions of tim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valu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024, 44(7-8): 760-775.
- [22] Ji L J, Guo T, Zhang Z, et al. Looking into the past: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past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6(4): 761-777.
- [23] Guo T, Ji L J, Spina R, et al. Culture, temporal focus, and values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2, 38(8): 1030-1040.
- [24] Shenkar O. Cultural distance revisited: towards a more rigorou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3): 519-535.
- [25] Trope Y, Liberman N. Construal-leve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0, 117(2): 440-463.
- [26] Johnston A I.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5, 19(4): 32-64.
- [27] Daft R L, Weick K E. Toward a model of organizations as interpretation syste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284-295.
- [28] Weick K E.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 [29] Gaertner S L, Dovidio J F.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M]//Van Lange P A M, Kruglanski A W, Higgins E T.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2.
- [30] 宣长春, 吴钧昊. 距离产生美? 时空视角下海外主流媒体中医报道的计算分析(2010—2023年)[J]. 新闻界, 2024(2): 86-96.
- [31]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J]. Science, 1987, 236(4799): 280-285.
- [32]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Ritter M, tra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 [33] Buzan B, Wæver O, de Wilde J.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M].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 [34] Bontempo R N, Bottom W P, Weber E U.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a model-based approach[J]. Risk analysis, 1997, 17(4): 479-488.
- [35] 熊名宁, 汪涛, 赵鹏, 等. 文化距离如何影响跨国战略联盟的形成——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解释. 南开管理评论, 2020(5): 145-158.
- [36] Eden L, Miller S R. Distance matters: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ownership strategy[M]//Hitt M A, Cheng J L C. Theories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diversity, complexity and relevance. Amsterdam: Elsevier, 2004.
- [37] Ketchley N, Andersen M S, Sending O J. The Chinese are coming! US think tank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6, 33(1): 318-348.
- [38] Subotić J. Narrative,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J].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16, 12(4): 610-627.
- [39]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he Lauder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R/OL]. 2021-01-28. <https://repository.upenn.edu/entities/publication/9f1730fa-da55-40bd-a1f4-1c2b2346b753>.
- [40] Hofstede G. Dimension data matrix[DS/OL]. Geert Hofstede(2015-12-08)[2025-09-30]. <https://geerthofstede.com/research-and-vsm/dimension-data-matrix/>.
- [41]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 411-432.
- [42]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 经济研究, 2014(12): 126-142.
- [43]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DS/OL]. World Bank(2024)[2025-09-30].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 [44] 綦建红, 杨丽. 中国 OFDI 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J]. 经济地理, 2012(12): 40-46.
- [45] CEPII. GeoDist: dist_cepil[DS/OL]. CEPII[2025-09-30]. https://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bdd_modele

- _item.asp?id=6.
- [46] 刘逸爽,陈艺云. 管理层语调与上市公司信用风险预警——基于公司年报文本内容分析的研究[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18(4):46-54.
- [47]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 [48] 郑一卉,杨向晖. 美国智库的任务转向:从学术研究到战略宣传[J]. 和平与发展,2024(1):109-131+206-207.
- [49] Cho K R, Padmanabhan P.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distance in MNC's foreign ownership mode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xperience attribut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5, 14(3):307-324.
- [50] 柯小俊,文子玉. 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舆论环境分析——基于X平台评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22-133.

Temporal Focus in Foreign Think Tank Narrative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Xiaoxia, Liu Yefu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s knowledge-producing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ical actors, think tanks shape particular narrative logics by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events through temporal frameworks. Temporal focus reflects how narrative actors selectively attend to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hile cognitive differences arising from cultural distance may influenc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nsequently shape temporal narratives. Drawing on texts produced by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foreign think tank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ultural distance affects the temporal focus of BRI-related narrativ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resent focus dominates these narratives, followed by past focus and future focus.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observed between BRI-participating and non-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past focus, think tanks from non-participating countrie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present and future focus than those from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Cultural distance positively predicts past and present focus in the narratives of think tanks from non-participating countries, with risk perception exerting a suppression effect on these relationships. In contrast, among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cultural distance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s future focus, while risk perception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cultural differences shape the temporal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 narratives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narrative competition surroun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sphere.

Key words: foreign think tanks; narrativ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emporal focus; cultural distance; risk perception

■ 收稿日期:2025-12-02

■ 作者单位:李晓霞,厦门理工学院影视与传播学院;福建厦门 361024
刘也夫,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责任编辑:肖劲草